

## 戰後初期臺灣的出版業（1945-1949）

蔡 盛 琦

### 摘 要

筆者曾於《國史館學術集刊》第5期中發表〈戰後初期臺灣的圖書出版—1945至1949年〉，文中因限於篇幅對於當時的出版業者著墨不多，本篇即意在補充前篇未論及的出版業者這一項。那個時期的圖書產銷系統並不明確，出版與銷售往往不分家，許多圖書幾乎都是由民間的書店出版，只要較具規模的書店通常都有著圖書的出版業務，故本篇雖然以出版業為主，但在探討出版這課題時，不免又涉及圖書的進口與銷售。

戰後臺灣的出版業因為面臨到政權的改變與不同文化的衝擊，出版業也必須適時在出版或經營內容上有所調整，首先是過去書店中所出版、販售的日文圖書，由中文圖書遞補上這個空缺；二二八事件後隨著日人的遣返，出版機構經營權跟著改變，許多不是結束營業，就是將其經營權轉移到臺灣人手中；另一方面，來自大陸的出版業陸陸續續在臺開始設立分店，對臺灣的出版業生態又注入一股新的元素。但是臺灣的圖書市場仍面臨到同一問題，即圖書貨源的匱乏，在這段精神苦悶、物質空虛的時期，臺灣的出版業者只好不斷地調整經營內容，開始以舊書買賣的方式，渡過這段圖書匱乏時期；而外來的出版業雖以銷售自家出版的教科書，開始立足臺灣，但是臺灣缺書的狀況並不因此得到解決，這種缺書的情形一直到1950年代開始大規模翻印圖書後，才漸漸有所改善。

關鍵詞：出版史、圖書、出版業、書店

## The Publication Business in Taiwan during the Postwar Years (1945-1949)

Sheng-chi Tsai\*

###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 sequel to my article “Taiwan’s publications in the Postwar Years 1945-1949” which appeared in the Volume 5 of Bulletin Academia Historica. Instead of discussing the publications, this paper looks at the business as a whole. At that time, the business of publication and sale was not separated, and most of the books were published by private bookstores.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issue of the sale of imported books.

In order to adjust to the new political environment, the publication business in Taiwan had to change their publishing and sales strategies. First, Japanese books were removed and Chinese books took their place on the shelves. Second, after the 228 Incident, many Japanese bookstores either terminated their business or transferred the management to the hands of Taiwanese people. Meanwhile, many publishing companies from mainland China began to set up their branch offices on the island, bringing new life to the business. But the major problem faced by all of them was a lack in books. Selling used books became an important business then. It was in the 1950s when reprints of old books were made possible that the lack in books was gradually lessened.

**Key words:**History of publication, publications, publishing business, bookstores

---

\* Assistant Researcher, Academia Historica

# 戰後初期臺灣的出版業（1945-1949）\*

蔡盛琦\*\*

## 壹、前言

筆者曾於《國史館學術集刊》第5期中發表〈戰後初期臺灣的圖書出版—1945至1949年〉，文中因限於篇幅對於當時的出版業者著墨不多，本篇即意在補充前篇未論及的出版業者這一項，那個時期的圖書產銷系統並不明確，出版與銷售往往不分家，許多圖書幾乎都是由民間的書店出版，只要較具規模的書店通常都有著圖書的出版業務，因此在探討出版這課題時，不免又涉及圖書的進口與銷售，故本篇雖然以出版業為主，但是對於書店這部分無可避免的必須論及。

戰後臺灣的出版業因為面臨到政權的改變與不同文化的衝擊，在這大時代的轉變中，出版業也必須適時在出版或經營內容上有所調整，首先是過去書店中所販售的日文圖書由中文圖書遞補上這個空缺；二二八事件後隨著日人的遣返，出版機構經營權跟著改變，許多不是結束營業，就是將其經營權轉移到臺灣人手中；另一方面，來自大陸的出版業陸陸續續在臺開始設立分店，對臺灣的出版業生態又注入一股新的元素；然而這些臺灣的圖書市場仍面臨到同一問題，即圖書貨源的匱乏，在這段精神苦悶、物質空虛的時期，臺灣的出版業者是如何走過變動的時代？舊有出版業如何轉型兼營其他的業務？外來的出版業如何在臺灣銷售自家的出版品？本文即以1945年臺灣剛光復到1949年政府遷臺時期的出版業為論述主題，探

---

\*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05年10月5日，通過刊登日期：2006年4月3日。

\*\* 國史館助修

討這五年中的出版業更興迭起。

過去對於這段時期出版業的相關探討並不多，雖有黃玉齋所編的《臺灣年鑑》一書中有談到戰後初期出版品的種類，但是對於出版業者並無論及；辛廣偉的《臺灣出版》一書泛論的是從戰後到 90 年代的各類出版；《中華民國出版年鑑》中的〈中國近百年來出版事業大事記〉對於 1945 至 1949 年臺灣出版事業大事記僅簡略條列 19 條，而刊載於同一年鑑中蔣紀周的〈我國圖書出版事業之發展與現況〉一文，則由漢唐開始直述政府遷臺以後；因此本課題可參考文獻資料較少，僅能從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編印的《館藏中文圖書目錄—民國元年至 38 年》目錄中可略窺當時的出版概況；而 1947 年出版的《臺灣年鑑》與《重修臺灣省通誌》中〈光復初期之圖書出版事業〉，對戰後出版事業僅有著概觀性記載；但較能真實反應出版文化的應為當時的報紙、期刊，本文參考的期刊有《臺灣文化》、《創作》、《新知識》、《新臺灣》、《文化交流》等刊物；而報紙則以《民報》、《人民導報》及《公論報》、《臺灣新生報》為主，這些報紙上所刊登的社論，表達了當時文化環境及知識分子的困境，其出版消息與書商廣告，真實反映了當時出版業的消長。

本文在內容安排上，第一節為前言；第二節先探討戰後出版業所面臨的衝擊；第三節談的是臺灣原有出版業者的易手與轉型；第四節討論的是大陸出版業陸續開始在臺灣設立分店，這些分店，多代表著官方與黨派系的運作，其中掌控住教科書的主導權，就可左右教材的內涵；最後希望藉由對這段時期出版業的轉型來看當時的文化環境。

## 貳、戰後出版業所面臨的衝擊

在日治時期臺灣的圖書出版幾乎都是由一些較具規模的書店兼營，如新高堂書店、文明堂書店、杉田書店，其他還有大木書房、盛興書店、清水書店等，其所出版與販售的圖書都以日文書籍為主，但書店大部分書籍

主要來源仍是由日本進口，書店是販售圖書外並兼營著出版業務。

而中文圖書的出版則非常少，嘉義的蘭記書店與臺中的瑞成書店是少數出版漢文讀本的本土書店，除了部分圖書在大陸印製外，書店仍都以販售圖書為主，另外還有連雅堂創辦的雅堂書局、蔣渭水的文化書局、莊垂勝的中央書局等，這些書店的共同特色就是不以商業活動為主，開書店的目的多負有傳遞思想的文化使命，書店販售的書籍，除了雅堂書局，因為以振興漢學為目的，只出售中文圖書外；其他幾家書店，都是中、日文圖書並陳，中文書部分，多以中國名著為主，其餘各類書籍，仍以日文書為主要；其中中央書局的日文圖書來自東京岩波書局、京都弘文堂，在當時是臺灣僅有販售日文高級書刊的書店；至於地區性的書店，並沒有出版業務，如豐原的彬彬書局、臺南的崇文堂、高雄的振文書局、屏東的黎明書局等，都是販售文具兼賣中文圖書，規模都不大。戰後隨著政權的改變，經營型態受外在因素衝擊，出版業者首先面臨到的是過去出版的日文圖書已無法再出版的局勢。

## 一、日文圖書的查禁

在日治末期，因為臺灣人的日語普及率已漸次提昇，<sup>1</sup>一般人多閱讀日文圖書，當時許多年輕人相信只要懂得日文就掌握了打開世界文明的鑰匙；許多年輕人頗習慣講日語，要他們用臺灣話來做知識性的溝通已感到困難。<sup>2</sup>在日語普及下書店所販售的幾乎都以日文圖書為主。

---

<sup>1</sup>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正中書局，民國 81 年），頁 359。日語的普及率，根據統計到了 1943 年以後，已高達到 51% 以上。也有的統計推算在 1945 年，二次大戰結束前，日本語普及率大約達 70%。當時臺灣人口約有 600 萬，照此比例估算，使用日語的人最少有 420 萬。黃英哲：〈許壽裳和臺灣（1946-48）——兼論二二八前夕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文化政策〉，《二二八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二二八民間研究小組，1992 年），頁 118。

<sup>2</sup> 周婉窈：〈臺灣人第一次的「國語經驗」——析論日治末期的日語運動及其問題〉，《新史學》，6 卷 2 期（1995 年 6 月），頁 134。

戰後隨著政權的轉移，語言文字也隨著改變，從日文到中文，戰後文化體制的建立，是依循著 1945 年公布的「臺灣接管計劃綱要」執行的，在「剷除敵人勢力」、「增強民族意識」的兩項原則下，禁用日文成為首要目標，首先是公文書、教科書及報紙上禁止使用日文；<sup>3</sup>然後是對日文圖書的查禁。

查禁日文圖書的重點在「去殖民化」與「去日本化」，當時接收政權不到四個月，在 1946 年 2 月時，行政長官公署即公告「查禁日人遺毒書籍」，開始查禁日文書籍及雜誌，對於已出版的日文出版品，採取銷毀與取締方式；查禁的範圍包括內容上「1.贊揚『皇軍』戰蹟者；2.鼓動人民參加『大東亞』戰爭者；3.報導占領我國土地情形，以炫耀日本武功者；4.宣揚『皇民化』奉公隊之運動者；5.詆毀總理總裁及我國國策者；6.曲解三民主義者；7.損害我國權益者；8.宣傳犯罪方法妨礙治安者」。<sup>4</sup>這些將被查禁的日文圖書先由各縣市政府公告後，再由各書店、書攤自行檢查、封存，聽候處理。

此一公告查禁書籍的四個月後，在 1946 年 6 月 23 日時，根據宣傳委員會主任的報告，依統計全省焚燬違禁圖書已達 1,451 種，47,500 餘冊。<sup>5</sup>如果由地區性來看，在 1946 年 8 月時，臺南市宣導股為以剷除日人遺毒圖

<sup>3</sup> 黃玉齋編：《臺灣年鑑》，「第七章 政治」（臺北：海峽學術，2001 年，重印版），頁 462-469。1945 年 3 月 14 日公布的「臺灣省接管計劃綱要」中第一章「通則」第一條：「臺灣接管後一切設施：以實行國父遺教、秉承總裁訓示，力謀臺民福利，剷除敵人勢力為目的。」

第一章「通則」的第四條是：「接管後之文化設施：應增強民族意識，廓清奴化思想，普及教育機會，提高文化水準。」；第七條：「接管後公文書、教科書及報紙禁用日文。」

第六章「教育文化」的第十二條：「日本占領時代印行之書刊、電影片等，其有詆毀本國、本黨或曲解歷史者，概予銷毀，一面專設編譯機關，編輯教材，參考，及必要之書籍圖表。」

<sup>4</sup> 〈查禁日人遺毒書籍〉，《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報》，1946 年春字第 8 期（1946 年 3 月 1 日），頁 133。

<sup>5</sup> 〈夏主任談本省宣傳事業〉，《臺灣新生報》，1946 年 6 月 23 日，版 4。

書為由，在市內檢查出《南方建設論文選》等書籍 63 本及唱片 12 片皆銷毀；<sup>6</sup>在臺北市方面，同年 12 月，由宣傳委員會會同警務處及憲兵團檢查臺北市的違禁圖書，共焚燬了 7,300 多冊日文書；至於其他七縣市所焚燬的日文圖書多達 1 萬冊以上。<sup>7</sup>

因此書店所面臨的情形是，過去宣傳戰爭的日文圖書被查禁無法再出版與陳售，再加上這一連串日文禁用的措施，日文圖書不再出版與進口，使得日文圖書銳減，但中文圖書又無法即時的遞補，臺灣市面上流通的中文圖書，仍是一些過去的舊藉，如《三字經》、《幼學瓊林》、《薛仁貴征東》、《羅通掃北》等，<sup>8</sup>即使有新版的中文圖書也多是一些宣導性的，以 1946 年《人民導報》記者所觀察到臺灣書店的景象是「書坊店簡直無一本像樣的書，百分之九十九在賣日本書籍，就是有幾家新書店，僅有《中國之命運》及《三民主義》一類的新書。」<sup>9</sup>而這類中文書根本無法滿足知識分子的需求。部分書店就在這青黃不接、無書可出的窘境階段，開始經營中、日文舊書的買賣，像是東寧書店、新創造出版社、蘭記書店、新高堂書店等，都曾經歷過這樣一段歷程。

等中文圖書開始出現於市面上時，最初都是一些迫切需要的教科書；然後是為學習國語而編製的工具書，此時臺灣各地普遍自發掀起了一場學

<sup>6</sup> 《民報》，1946 年 8 月 21 日，版 2。

<sup>7</sup>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編：《臺灣一年來之宣傳》（臺北：編者，1946 年 12 月），頁 24。該書指出：「本省光復後，本會（宣傳委員會）為肅清日人在文化思想上遺毒起見，特訂定取締違禁圖書辦法八條，公告全省各書店、書攤，對於違禁圖書應自行檢查封存聽候處理，並由署令各縣市政府遵照辦理，至臺北市部分，則由本會會同警務處及憲兵團檢查，計有違禁圖書八百三十六種，七千三百餘冊，除一部分由本會留作參考外，餘均焚毀，其他各縣市報告處理違禁圖書經過者，計有臺中、花蓮、屏東、高雄、臺南、彰化、基隆等七縣市，焚毀書籍，約有一萬餘冊。」

<sup>8</sup> 〈建設臺灣新文化〉，《臺灣新生報》，1945 年 11 月 6 日，版 2，說到當時中文圖書缺乏的情形：「目前中文的讀物幾等於零。愛讀的情緒，如饑如渴，而所有的書籍，恐不外《三字經》、《幼學瓊林》、《薛仁貴征東》、《羅通掃北》等。」

<sup>9</sup> 龍汨夏：〈到臺一週後的見聞及感想〉，《人民導報》，1946 年 6 月 16 日，版 4。

習中文和國語的群眾性運動，如飢如渴地閱讀到可能到手的中文書報，<sup>10</sup>中文圖書的出版和進口，就在如火如荼的國語運動推行下開始的，這些國語教材、會話、辭典等，在學國語熱潮下成了非常搶手的圖書。

另一方面，在抗日勝利與民族情感發酵的時代氛圍中，民眾對這新時代充滿了期待，於是出現許多以認識祖國為題的圖書，一些以介紹國旗、國家，與建設國家經典的《三民主義》、《建國大綱》陸續出現市面上，透過這些象徵圖騰，建構國族認同，反映這種社會思潮的出版彷彿蔚然形成一股風潮，其中又以官方宣導品為最，因為掌握了印刷資源，印製了數量可觀的官方宣導品，並將這些宣導品視為建立國家民族認同的重要工具。<sup>11</sup>

大量的宣導品無法取代原本的閱讀市場，日文書與中文書青黃不接的時期，不只是中文圖書數量與種類上，都極度的缺乏；除了缺書狀況，又加上戰後幣值貶值，政治、經濟問題接踵而來。

## 二、物價波動下圖書價格昂貴

臺灣受限於印刷及銷售量的關係，無法大量印製出版品，在日治時期圖書多從日本進口，市面上流通的多以日文圖書為主，對於文化與思潮的接觸，往往必須透過日文譯本；戰後初期臺灣對於西方思潮與五四文學的輸送，則仰賴大陸，隨著此股文化思潮傳入的重要媒介，即是一批批由上海運來臺灣的中文圖書。上海是近代出版業的重心所在，<sup>12</sup>因此戰後臺灣

<sup>10</sup> 王思翔：〈臺灣一年〉，見葉云云編：《臺灣舊事》（臺北：時報文化，1995年），頁28。

<sup>11</sup>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編：《臺灣一年來之宣傳》，頁22-23。1946年起行政長官公署大量翻印《三民主義》、《建國方略》、《總裁言論》、《陳長官治臺言論》等書籍，其中《三民主義》譯成日文，共印了10萬冊；《臺灣指南》印了5千冊；《民主政治手冊》……等宣傳小冊，印了30多萬冊。

<sup>12</sup> 這是因為上海有租界，清政府對於此地的出版無法管轄；另一方面，其地理位置有利於新式印刷技術的輸入，故取代過去科舉重心的北京，而成為近代出版業的重心。



與上海之間的無可避免的文化交流，而臺灣所進口的中文圖書，也大部分仰賴上海以輪船運載來臺灣。雖然不少圖書來自上海進口，但並未解決臺灣缺書的狀況，在物價波動下進口圖書的價格高昂，而在臺灣自行印製成本又高，非一般人所能負擔，圖書成了一般人無法負擔的奢侈品，圖書買的人少，書店不得不改弦易轍，改變其經營方式。

在日治時期從日本運來的日文書籍，除定價外必須再加上裝船運費，因此當時「臺灣書籍商組合」規定臺灣的書價為日本定價加一成，而引起讀書人不滿，《臺灣日日新報》曾呼籲全島讀書人抗拒此一不合理的書價。<sup>13</sup>政權易手後，臺灣圖書市場由日文轉為中文，圖書則自上海輸入，所運來中文圖書售價仍是一大問題。因為法幣與臺幣的換算上一直有所爭議，<sup>14</sup>早期臺幣與法幣匯率折算上，規定 1 比 20，上海法幣貶值物價上漲，但對臺幣匯率卻沒有跟著調整，例如在 1946 年 6 月時，上海物價已漲到一個人的生活所需法幣 20 至 30 萬元的程度，如果以這種消費水準在上海花 3,000 元買一本書不算貴，但運到臺灣後一本書的價格在舊臺幣 100 多元左右，以當時一位報社校對員一個月的薪資約 500 至 600 元來看，書籍價格並非一般普通人所能負擔的，這些都足以影響臺灣文化事業的蓬勃發展。<sup>15</sup>書店方面，除了在匯率上有很大的利潤外又常常可以任意抬高書價。<sup>16</sup>

另一方面從 1946 年開始，臺灣社會環境因為物價問題而急速轉壞，光復後的狂喜與日俱減、物價的飛漲、米荒的嚴重、一部分的貪官污吏的依舊橫行，失業者的加劇等等問題層出不窮。<sup>17</sup>根據「臺北市躉售物價指數

<sup>13</sup> 河功原撰，黃英哲譯：〈戰前臺灣的日本書籍流通（中）〉，《文學臺灣》，28 期（1998 年 10 月），頁 285。

<sup>14</sup> 陳儀為了減少中國大陸惡劣的財經體制對臺灣經濟造成衝擊，於 1945 年 11 月正式通告嚴禁中央政府的法幣在臺灣流通，貫徹在臺灣必須使用臺灣銀行發行的貨幣政策，但這樣的區隔效果卻是有限的，因為透過匯兌，臺灣銀行仍然必須增加臺幣供給以兌換法幣，所以中國大陸幣值是否穩定，也會影響臺灣。

<sup>15</sup> 〈論本省文化建設〉，《臺灣新生報》，1946 年 6 月 19 日，版 2。

<sup>16</sup> 金星：〈挽回讀書好風氣〉，《公論報》，1948 年 2 月 10 日，版 4。

<sup>17</sup> 〈社論：冬到春不遠〉，《民報》，1946 年 5 月 22 日，版 1。

變化表」來看，臺北市從戰後迄二二八事件前夕，物價指數增加近 35 倍。

<sup>18</sup>臺灣的圖書文化事業也在這種經濟動亂的時刻，呈現一片的低迷。

上海又受內戰影響，經濟混亂，出版事業也深受打擊，在〈出版業者的危機和讀者的厄運〉一文中，即指出上海出版事業已遭受著空前的危機，在 1947 年 9 月時印刷費比上月增加一倍，報紙價格又漲五成，致使各出版刊物紛紛收縮或停辦。而出版業的危機自然影響到讀者，出版成本高漲，加上進口運費，以致許多輸入的中文圖書，書價過高，讀者買不起自己所愛讀的刊物。<sup>19</sup>

到了 1948 年書價在臺灣波動甚巨，如在 1948 年 11 月 10 日時，原本兩冊《世界通史》賣臺幣 44,000 元，到第二天即漲至 66,000 元，一夜之間約漲了 50%，原因是上海的米價漲了。另一例子是長春書店自 11 日起圖書與臺幣匯率也一律提高 50%，薄薄一本書，索價數千元，有污損的，又不許挑選。1948 年 10 月時《魯迅全集》每部賣價臺幣 20 萬，到同年 11 月時已漲到 120 萬。據說如直接向上海郵購，可以便宜 4 倍以上。<sup>20</sup>在混亂的物價波動下，到 1949 年元月時《辭海》、《辭源》已漲到 58,000 元，兒童節前夕一冊兒童讀物可賣到 5,000 至 8,000 元。如此書價昂貴，民眾即在國共內戰與政經層面雙重影響下，所能顧及的僅是現實民生問題，對於圖書精神層面的需求恐早已無暇追求，自 1949 年以後的報刊上，即可發現圖書廣告幾乎已絕少出現。

### 三、紙張匱乏與出版低迷

因為由上海運來的書籍太貴了，一般人買不起，於是也有人建議在臺

<sup>18</sup>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編：《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臺北：編者，1946 年 12 月），頁 897。

<sup>19</sup> 《臺灣文化》，2 卷 6 期（1947 年 9 月），頁 14。

<sup>20</sup> 〈文化商人大事賺錢，本市書價無理狂漲〉，《公論報》，1948 年 11 月 3 日，版 3。

灣直接翻印圖書，讓臺灣出版組織可以和大陸的書局訂立翻印契約，以解決臺灣缺書的問題，<sup>21</sup>但是臺灣的紙張匱乏又是另一個問題。

戰後嚴重的社會問題，來自於戰爭時各項生產設施的破壞，導致戰後物質材料的匱乏、復工與重建的腳步緩慢，過去臺灣雖有造紙廠，有油墨廠，有大規模的印刷廠，但戰後原來日人所經營的印刷公司，戰後一律由行政長官公署接收，將所接收的七家印刷廠、兩家油墨廠、五家造紙廠，統合為「臺灣省印刷紙業股份有限公司」。統合後的印刷紙業公司一直經營不善，後來除了一部分保留公營外，其餘標售民營，但是民營後的印刷廠能力也僅及日治時期的二分之一。<sup>22</sup>對於印刷用紙「配給」制與印刷的托辣斯組織在《新知識》月刊中被評為「從根本上造成文化的專制與獨占」<sup>23</sup>。

由於紙張的產量不足，影響到圖書的印刷出版，在 1946 年 2 月 3 日《民報》社論〈促進文化的方策〉一文中即對此種現象，提出文化建構的積極建議：

第一要促進我國內地的文化儘量流入，第二要解決紙和印刷費用的暴騰問題，銷路不廣的學術的刊物，沒承印的書店，泛濫在街上的大部分只是那《千字文》、《百家姓》或是「國語學習書」之類而已，此類的「刊物」之泛濫，決不是臺灣文化的榮譽，第三要鼓勵臺灣自身的臺灣文化的研究。<sup>24</sup>

其中第二點即是針對紙張與印刷問題而言，因為配給紙取得不易，紙張供應問題與費用的高漲，影響到文化產業的發展。

1948 年時臺灣紙業公司以代電通知報業公會，說因製紙原料匱乏，生產銳減，而影響原料的原因是因「物料價格劇增」；但是事實上卻是臺紙大

<sup>21</sup> 江南秀：〈希望於臺灣的文化建設〉，《臺灣新生報》，1948 年 1 月 1 日，版 15。

<sup>22</sup> 東之：〈急待拯救的臺灣印刷工業〉，《臺灣新生報》，1949 年 3 月 6 日，版 3。

<sup>23</sup> 張禹：〈現階段臺灣文化的特質〉，《新知識》月刊，覆刻版（民國 35 年 8 月 15 日），頁 4。

<sup>24</sup> 〈促進文化的方策〉，《民報》，1946 年 2 月 3 日，版 1。

量運銷到紙價更高的內地市場出售圖利，<sup>25</sup>致使紙張匱乏，紙價一下子高漲八、九倍，對於印刷文化事業打擊頗大。

到 1949 年年初時，更由於臺灣紙業公司因為紙張滯銷和流轉資金拮据，已整個陷於無力支撐的絕境，臺灣紙業公司所屬高雄、臺南兩家紙廠已經宣告停工。<sup>26</sup>

因為印刷用紙的匱乏，直接影響到圖書的出版量；在原本禁用日文的階段，不論閱讀風氣或是創作都不如以往，尤其慣以日文從事創作的本省作家，頓時喪失了可發揮的創作空間，創作品的減少，連帶影響到圖書的出版量。對於這些現象在 1948 年 4 月創刊的《創作月刊》中談到「作家」，作家們可發表作品的刊物少了，迫於生活不得不擱筆；對讀者來說，一日千漲的紙張，讓想閱讀的人也買不起書：

勝利並沒有解脫作家們生活的艱苦，隨著戡亂而來的，是文日以窮，而生日以減。可以發表文章的刊物停了，可以登載作品的報章關門。剩下來有限的幾份，隨著人事，內容，乃至妥協投機等問題，作家即使在餓死的威脅下，也不得不擱筆。

至於書籍印行呢？紙張之一日千漲且不說，要看書籍的人，其窘況不下於作家，購買力是談不到的。而能夠有購買力的人，是以讀書為迂腐的；因此，即使作品被書店刊印了，只能使熱誠的讀者興嘆，使檢查的人員費事，使書店老闆大呼倒楣。<sup>27</sup>

再經歷二二八事件後，許多言論受到限制，創作更是一片低迷，更讓剛起步的臺灣出版業帶來很大的衝擊，在創作品減少的情形下，書店沒有可出版的書籍；過去幾家出版圖書的書店也因為結束營業，而停頓了出版工作；也有的書店幾經易手改弦易轍，不再以書店為主業。

<sup>25</sup> 〈社論：新聞事業不容摧毀〉，《公論報》，1946 年 11 月 17 日，版 2。

<sup>26</sup> 《臺灣新生報》，1949 年 1 月 5 日，版 3。

<sup>27</sup> 鍾華：〈文藝簡論〉，《創作月刊》，1 卷 1 期（民國 37 年 4 月 1 日），頁 8，《臺灣舊雜誌覆刻系列》3 之 1。

### 叁、原有出版業者的易手或轉型

戰後重要的出版機構除了長官公署、臺灣編譯館官方機構外，民報與臺灣新生報社因為擁有印刷設備而有一些圖書的出版；官方經營的書店「臺灣書籍株式會社」，戰後初由長官公署接收後，在1946年時又由省教育廳接收，改組為「臺灣書店」，隨著長官公署與省教育廳主管單位不同，臺灣書店的主持人雖有不同，大抵而言，其出版販售仍以官書及教科書相關出版品為主，主要為了供應中小學教科書，並供應公務員補習國語的教本、銷售過去由編譯館所出版的「名著譯叢」與「光復文庫」等書，並經售外版書刊，這些書刊均是購自上海各書店，從1946年12月到1947年5月，六個月的時間銷售了150種1萬冊左右的外版書刊。<sup>28</sup>在民間出版機構方面，日治時期幾家有名的書店如新高堂書店、東寧書店，在戰後都面臨了新的局勢，其中日人民間所經營的書店不是結束營業，即是轉手經營；本土所經營的書店，有許多在日治時期原以出版歌仔冊為主，戰後改變經營方針，只出版佛書及善書等宗教書籍；<sup>29</sup>有些是戰後更名，這些書店由日治時期持續到戰後，其經營項目隨著戰後不同文化的衝擊而開始有不同的轉變。

#### 一、日人經營的易手

戰後百業蕭條，原本慘淡經營的圖書出版業，在經過二二八事件後，更是雪上加霜，許多日人遣返回日，因為受限於離境時規定，各人只准攜

---

<sup>28</sup> 陳鳴鐘、陳興唐主編：《臺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南京：南京出版社，1989年），頁387。

<sup>29</sup> 王順隆：〈談臺閩「歌仔冊」的出版概況〉，《臺灣風物》，43卷3期（1993年9月），頁126。

帶千元以下離境；<sup>30</sup>於是許多日人經營的書店，被迫結束營業；也有的為避免充公，經營者在遣返前，往往將經營權轉移給臺人接手，以極低的價格，甚至免費奉送的方式轉移給臺灣人；或者讓臺人當名義上的經理，以此避免被沒收，這種情形以東都書籍株式會社臺北支店為代表。

### (一)從「東都書籍株式會社臺北支店」到東寧書店

東都書籍株式會社原為三省堂的經銷店，1934 年時東都書籍株式會社<sup>31</sup>成立臺北支店，以經銷一般書籍為主，並且經銷一些雜誌及中等教科書。三省堂除了設立東都書籍臺北支店外，另外還設立了三省堂臺北辦事處，專營宣傳三省堂的出版品，並且支援東都書籍臺北支店的經銷業務。原為日本「三省堂」經銷書店的「東都書籍臺北支店」，不僅僅是經銷圖書並且有圖書的出版，曾出版過 70 冊以上的書籍，是臺灣出版社中數量最多者，甚至超過了關係企業「三省堂臺北辦事處」。

戰後店長持田辰郎解除軍職後，返回書店，面對成堆的日文圖書，因為都是宣傳戰爭的日文書已失去價值，必須銷毀，持田辰郎只得先將這些戰時宣傳用書裁碎銷毀，書店在無書可賣的情形下，雖然想出版新書，但印刷用紙極端缺乏，被轟炸的印刷廠亦未恢復生產，於是只能 10 月時另設「東寧古書部」，專門從事舊書的蒐購與販售，並兼營委託販售。<sup>32</sup>

但是很快的東都書籍臺北支店於戰後 1945 年 11 月起恢復圖書的出版，這段時期出版了林熊生（金關丈夫）的日文小說《龍山寺の曹老人》；

<sup>30</sup> 「臺灣省處理境內撤離日人私有財產應行注意事項」中所規定，日人財產需送「日產處理委員會審核」，日僑私有財產不動產一律沒收，各人只准攜帶千元以下離境。

<sup>31</sup> 東都書籍株式會社原為三省堂的經銷店，三省堂於 1881 年在東京神田所成立，原本從事舊書的買賣，1892 年以後才停止舊書業，轉而專營新書的零售和出版；1915 年時三省堂分成「三省堂株式會社」與「三省堂書店」，三省堂株式會社專營出版與印刷業務，三省堂書店則專事新書的零售。到了 1928 年，「三省堂書店」法人化，成為「三省堂書店株式會社」；而過去以出版為主的三省堂，則另設立「東都書籍株式會社」做為三省堂專屬的經銷店，專門從事三省堂出版品的批發與販售。

<sup>32</sup> 〈東寧書局廣告〉，《臺灣新生報》，1946 年 2 月 4 日，版 1。

接著因應民眾學習國語的熱潮，針對慣用日語的臺灣民眾，出版了一些以日文解說，學習中文的入門書，如《華語新聞の読み方・基礎篇》、《初級華語會話》。

戰後為了書店避免被國民政府接收，於是在池田敏雄<sup>33</sup>的建議下，又於1945年11月3日，以黃廷富<sup>34</sup>名稱改稱「東寧書局」；同時也將書局的部分店面，改為餐飲部「東寧喫茶店」。<sup>35</sup>

改名後的東寧於1946年時，又陸續出版了日人種村保三郎所編的《獨習華語入門》等，及其他日文版的圖書，如《中國の運命》、《新生活運動綱要》、《三民主義の研究》、《孫中山先生傳》、《民生主義概說》等等。

戰後初期的東寧書店仍維持過去旺盛的經營能力，但是這段期間並不長，到了1946年以後開始衰退，這是因為在1946年的二二八事變後，緊急決定日本人必須撤離，使得東寧書局遭到關閉。在關閉之際，原東都書籍臺北支店所有財物，經池田敏雄介紹，交由黃榮燦接收。<sup>36</sup>

## (二)新創造出版社

原任職《人民導報》副刊主編的黃榮燦，與馬銳籌、朱鳴崗、李凌等三、四位朋友合股頂下東寧書店，接手後將其改名為「新創造出版社」，他們幾個人原是傾向於社會主義的路線，在接手書店後，除了仍留用日僑立石鐵臣，<sup>37</sup>共同商討發行文藝美術月刊外；<sup>38</sup>並企劃各項出版活動，創刊雜

<sup>33</sup> 池田敏雄與東都書籍臺北支店長持田辰郎同為島根鄉同鄉。

<sup>34</sup> 黃廷富留學於京都大學，是臺灣最早的法學博士，是日本立命館大學教授，其女黃鳳姿以寫《臺灣的少女》轟動全臺，戰後嫁給池田敏雄。

<sup>35</sup> 河功原撰，黃英哲譯：〈戰前臺灣的日本書籍流通（下）—以三省堂為中心〉，《文學臺灣》，29期（1999年1月），頁215-216。

<sup>36</sup> 河功原撰，黃英哲譯：〈戰前臺灣的日本書籍流通（下）—以三省堂為中心〉，《文學臺灣》，29期（1999年1月），頁217。

<sup>37</sup> 原東都書籍臺北支店發行的《民俗臺灣》即由立石鐵臣負責編輯。

<sup>38</sup> 梅丁衍：〈黃榮燦疑雲—臺灣美術運動的禁區（上）〉，《現代美術》，67期（1996年8月），頁52。

誌《新創造》(1947年3月);<sup>39</sup>並且曾與立石鐵臣計劃過要出版一系列的《左聯叢書》。

新創造出版社位址在日治時期是樺山町，即是中山南路與忠孝西路交叉口地方（此處後來改建為「臺北市議會」，現為警察局之用）。樓下是店面，樓上是辦公室和宿舍，黃榮燦利用這個店面經營書店，以極低價購進日僑撤離無法帶走的《世界美術全集》、《世界裸體美術全集》、《世界名作家全集》等，從樓下一直堆到樓上。<sup>40</sup>但是全都是日文書籍，於是在該社成立四個月後，合股人李凌便前往香港與三聯書店（讀書出版社、新知書店和生活書店三家合併）的北京總店負責人黃洛峰商量，將該社改為三聯書店的「臺灣分館」，並繼續延用「新創造出版社」店名，引進上海、香港版的中文書刊。<sup>41</sup>這階段的新創造出版社曾於1946年出版過由李凌編的《新音樂歌選集》、劉白羽的《成長》、張天翼的《新生》等文藝叢書，而黃榮燦編的《珂勒惠支畫集》也在此時出版。<sup>42</sup>

但是帶著左傾色彩的三聯書店，本身曾出版過宣傳抗日及啟發進步思想的書刊，屢遭到政府干預；而當時新創造出版社中負責經營的經理曹健飛本身即是共產黨員；在1947年發生二二八事變後的第八個月，新創造出版社奉上級命令「自行停業」，產權頂讓出去後，書店從此搖身一變成了一家商行。<sup>43</sup>新創造出版社的結束，象徵著左傾思潮的圖書，從此退出臺灣，而日治時期的東都書籍會社，也自此在臺灣的出版業消失。

<sup>39</sup> 河功原撰，黃英哲譯：〈戰前臺灣的日本書籍流通（下）——以三省堂為中心〉，《文學臺灣》，29期（1999年1月），頁217。

<sup>40</sup> 葉龍彥：〈第一位來臺的木刻畫家——黃榮燦〉，《臺北文獻》，直字128期（民國88年6月），頁109。

<sup>41</sup> 梅丁衍：〈黃榮燦疑雲——臺灣美術運動的禁區（上）〉，《現代美術》，67期（1996年8月），頁52。

<sup>42</sup> 〈新創造出版社廣告〉，《人民導報》，1946年10月15日，版4。

<sup>43</sup> 葉龍彥：〈第一位來臺的木刻畫家——黃榮燦〉，《臺北文獻》，直字128期（民國88年6月），頁115-119。



### （三）三省堂與掬水軒

而其關係企業臺灣的三省堂除了於 1946 年 3 月出版了楊逵短篇集《鵝媽媽出嫁》日文書外；並立刻開始販售過去私塾所使用的《三字經》、《千字文》、《千家詩》等學童識字書，雖然此時民眾正在學習國語階段，但此類識字圖書已不符合當時的需要；接著三省堂又出版了香坡顧一著的《華語自修書》4 卷及經銷《華語學生辭典》、《國語發音辭典》等書，<sup>44</sup>這些針對慣用日文的臺灣人所使用學華語的書籍。

三省堂的書後來交由「掬水軒」，掬水軒除了仍繼續發售三省堂所經銷的書籍外，亦經營茶室，書店經營茶室似乎是種潮流，一樓不但售書兼營茶室，二樓還是餐廳。<sup>45</sup>

### （四）東方出版社

日治時期另一家舉足輕重的大書店一新高堂書店，是由臺北市長游彌堅接手。新高堂書店由村崎長昶創設於明治 31（1898）年，村崎長昶是當時臺北信用合作社及實業社的理事。該書店是少數能從日本出版社直接批書的書店。<sup>46</sup>除了零售經銷各類日文圖書外，並且供應各級學校的教科書，並提供總督府圖書館的圖書採購，且有許多官方出版品由新高堂出版，是日治時期臺灣最大的書店；<sup>47</sup>日本戰敗後村崎長昶黯然離開臺灣，在 1946 年時由游彌堅的東方出版社接手。

東方出版社是由游彌堅於戰後 1945 年成立，游彌堅一直被視為宋子文系的一員，他以財政部臺灣區財政金融特派員身分返臺，不久即接任黃朝

<sup>44</sup> 〈廣告〉，《臺灣新生報》，1945 年 11 月 25 日，版 1。

<sup>45</sup> 〈掬水軒廣告〉，《人民導報》，1946 年 10 月 16 日，版 4；1946 年 4 月 6 日，版 1。

<sup>46</sup> 最初如文明堂等進書都是須透過內地經銷業者間接買入；隨著日本語的普及，日文圖書的需求增加，才開始有日本的出版社每年到臺灣來與書店直接交易，如三省堂、大阪的駿駿堂、松谷啟明堂等。

<sup>47</sup> 蔡盛琦：〈新高堂書店：日治時期臺灣最大的書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9 卷 4 期（2003 年 12 月），頁 38-40。

琴出任臺北市長，並擔任「臺灣省接收委員會」、「日產處理委員會」臺北市分會的主任委員，有其職位上便利，游彌堅在其任內，以市營之名接收了醫院、工廠、瓦斯會社等日人產業，<sup>48</sup>在 1946 年則接收了新高堂書店。

東方出版社初成立時書籍的來源是舊書，先是由南昌街的鴻儒堂、大陸書店等書店進一些舊日文書販售，以及收購當時留居臺灣日僑返國後所遺留下的書籍；真正較具規模開始有出版及新書銷售，是接收了新高堂書店以後。

接收新高堂書店後的東方出版社，負責人亦由游彌堅換為林呈祿，林呈祿任董事長後專力出版事務，到 1950 年時，東方出版社正式成立為股份有限公司的型式，是臺灣最早具規模的出版社。

戰後初期臺灣曾風行過魯迅的作品，在這階段東方出版社也推出了不少中日對照叢書，有由王禹農日文譯注，魯迅的《孔乙己、頭髮的故事》、《藥》等；這對中文尚不熟悉的臺灣人來說，閱讀中日文對譯的圖書是既可學習國語，又可欣賞現代文學的著作。

而後由 1948 年的報紙廣告，可以發現此時東方出版社出版的主軸以教材、自修書為主，如《機械用語新字典》、《初中國文自修輔導》、《高小國語自修指導》等補充性質的參考書，因為這階段的教科書市場已為特定幾家書局所掌握，東方出版社則以出版輔助教材的週邊出版品為主。由於教科書的缺乏，使得官方、民間都必須投入教科書市場，在這有限的出版資源下，以致影響其他類別圖書的發展。

#### (五)香華書館

日治時期一度與新高堂並稱的書店是文明堂書店，位置在臺北市文武

---

<sup>48</sup> 陳翠蓮：《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相》（臺北：時報文化，1995 年），頁 237。游彌堅原名游阿碧，臺北內湖人，由於其妻王淑敏之父曾任財政部司長，是宋子文的部下，游彌堅也曾任職財政部，因此被視為宋系人馬。戰後游彌堅以財政部臺灣區財政金融特派員身分返臺，未幾接任黃朝琴出掌臺北市。游彌堅在臺北市長任內，以市營之名接收了醫院、工廠、瓦斯會社等日人產業，備受爭議。

街（即過去的榮町二丁目）。雖然以售書為主；但當時也出版文藝類的書籍，戰後則改名為香華書館，負責人亦由女老闆長谷川轉手黃阿福經營，書店也同時經營茶室。這時期的書店圖書數量本已稀少，買得起書的人不多，書店為了經營下去往往隔出一部分兼營茶室，是書店經營的另一種方式。

## 二、本土書店經營內容的轉變

日人所經營的出版業迫於現實不得不易手，而臺灣人所經營的幾家書店也有不同的轉變，例如雅堂書店早在 1929 年即已歇業；蔣渭水的文化書局在 1931 年其過世後，即結束營業；中央書局則轉手經營，仍維持其中部文化使命重鎮；另外還有些過去以銷售歌仔書、善書為主的書店，如瑞成書局、蘭記書局，戰後在改變其經營內容後，仍持續經營著。

### （一）瑞成書局

在臺中的瑞成書局，原是以印佛教經典勸世文起家的書局，該書局由許克綏先生創立於 1912 年，在日治時期因酷愛漢學於是開設書局，以販售雜誌、文具、書本、醒世文等中文圖書為主，書籍是由許克綏親至上海廈門等地大批洽購而來。漸具規模後，到了 1932 年時又另創設了瑞成印刷廠，擁有鉛字印刷機，以印一些佛教經典、勸世文本、警世標語等為主。

戰後初期面對新的時代政權，書局迅速將戰前印製的歌仔冊封皮的日本年號換成民國年號，即重新發行販賣，為期很短，即在國語運動的衝擊下，白話文的中文圖書取代了這些警世勸言、及歌仔冊，過去這些書的銷售已大不如前了。

在時代的轉變下，書局不斷地改變經營內容與讀者的需求，該書局迄今已有百年歷史，由最初的二十坪小店開始，幾經搬遷，歷經三代經營，到現在成了擁有二百多坪賣場，以其企業規模下經營有一家出版社、和一

間印刷廠的大書店。<sup>49</sup>

## (二)蘭記書局

位在嘉義市的蘭記書局，是中部有名的書店，於 1917 年時由黃茂盛所創辦，在日治時期就以出版中文圖書、私塾用書而有名。戰後 1946 年時書局經過整建後於 5 月重新開業，並於《臺灣新生報》上刊登「新築完成照常開業」的廣告，此時的蘭記書局已開始順應學習國語的潮流，銷售新式國語讀本，如《高級國文讀本》、《注音國語讀本》、《繪圖國語讀本》等等；另外像當時所流行的書籍如《三民主義》、《中國革命史》、《孫文小傳》等亦成為書局的銷售書籍。<sup>50</sup>但對於過去的《三字經》、《千家詩》、《兒童尺牘》等仍有銷售；而此階段的蘭記已有計畫的出版字典，像黃森峰編輯出版的《國音標註中華大字典》、《國臺音萬字典》均已在印刷中，其中《國音標註中華大字典》則於同年 7 月 10 日正式出版，一共四冊，是最早的本土出版品，<sup>51</sup>有相當好的銷售量。

因為缺乏紙張、圖書匱乏，書店可出版書的很少，舊書買賣成為書店經營的另一項目，蘭記書局和東都書店一樣，亦有經營舊書的買賣，報紙廣告上經常可出現徵求舊籍的廣告；在 1946 年《臺灣新生報》的廣告上有：「收買古書，不論中文、日文、英文，不拘種類；如承割愛一律高價買受」；「買入價格中文書自 20 倍到 100 倍，日文書自 5 倍到 20 倍」，買入價格為原書價 5 倍至百倍，除了原本物價飛漲外，圖書的貧瘠，尤其中文圖書的缺乏也是以高價買入的重要原因，有時在蘭記書局收買古書的廣告中亦有列出買入賣出的價格，像《辭源》三冊買入是 900 元，賣出價 1,200 元；《辭海》二冊買入價 1,500 元，賣出價是 2,000 元。書局以舊書買賣賺取價差。從舊書買賣公定價看來，當時舊書買賣的風氣是非常普遍的現象。當時圖

<sup>49</sup> 《臺灣書店地圖》（臺中：晨星，2004 年），頁 165-169。

<sup>50</sup> 〈蘭記書局廣告〉，《臺灣新生報》，1946 年 5 月 26 日，版 1。

<sup>51</sup> 〈蘭記書局廣告〉，《臺灣新生報》，1946 年 7 月 27 日，版 3。

書匱乏，書店根本無書可賣，舊書買賣成了知識分子精神食糧的另一管道；而待遣返的日人急於拋售無法帶回去的東西，也開始擺攤賣舊書、舊貨。當時被強制遣返的日人規定准帶些簡單衣物日用，包括圖書若干冊也以「以與作戰無關而非歷史性書籍及文件報告書統計數字暨其他類似資料者為限」，每人攜帶物品須「一挑自行搬運上船」；因為沒有辦法帶太多東西回去，於是一干私人文物，就此流散出來。<sup>52</sup>

而在蘭記「收買古書」的廣告中，並且註明「如有藏書出讓，自當派員接洽」<sup>53</sup>，可知舊書買賣的搶手，書店除了可以直接買賣外，在書源缺乏下有些版本的書，也可直接翻印成新書。

### （三）中央書局

位於臺中的中央書局，創設人是莊垂勝，他留學東京，留學期間值第一次大戰後，民主思潮澎湃於世界，新文化運動急遽展開，莊垂勝置身其間，受其影響極大。返臺後參加臺灣文化協會，深感從事文化啟蒙運動，應有文化氣氛的環境，於是在 1925 年時，得到中部會員及支持者的認股下，籌設中央書局，使之成為文化協會運動的據點，且為中央俱樂部事業之一，並於 1927 年開始營業，是本省人經營的各書局中資本最雄厚的。

日治時期的中央書局以進口日文圖書為主，努力介紹日文高級刊物。戰後莊垂勝已任臺中圖書館館長一職，中央書局董事長則由臺中縣參議員張瑛珪<sup>54</sup>擔任。書局面臨社會的變革，環境的變動，除了以販售教科書及出版參考書為主外，仍然為臺中市文化界的重鎮，戰後臺中市文化人士因

<sup>52</sup> 子朴：〈臺北舊書業史話〉，收錄於應鳳凰、鐘麗慧編：《書香社會》（臺北：文建會，1984 年），頁 376。

<sup>53</sup> 〈蘭記書局廣告〉，《臺灣新生報》，1946 年 11 月 12 日，版 1。

<sup>54</sup> 張瑛珪（1902-1980），臺中縣大雅鄉人，字璜山，又字璞真，筆名沐真，1920 年臺中中學校畢業，其後又先後肄業於東京明治大學法科及上海大學。留學上海時，曾加入無政府主義色彩的「平社」，並以筆名在社刊《平平》旬刊上發表文章。秦賢次：〈《新知識》導言〉，《新知識》，重刊本，頁 7。

感臺灣書刊極為缺乏，而創刊了《新知識》月刊，<sup>55</sup>委由中央書局發行，月刊是由王思翔、周夢江主編，帶著左傾色彩的《新知識》月刊，雜誌才印好尚未發行，即被臺中市政府查封沒收。<sup>56</sup>在這批文化人的努力下又繼續創辦了《文化交流》雜誌，但在二二八事件後又再度停刊；而中央書局在這些波瀾中，仍擔負臺中的文化工作，書店的經營亦維持到 1996 年才歇業。

#### (四)三民書局

嚴格的說蔣渭川的三民書局不算是出版機構，但代表著臺灣文化界的另一股勢力，蔣渭川是日治時期「臺灣民眾黨」創始人蔣渭水的弟弟，他於 1934 年在臺北創設的日光堂書店，原名「臺北堂書店」，後因有同名書店而改為日光堂書店。蔣渭川當時是一活躍的商人，他於戰前擔任「臺灣省書籍雜誌商組合理事」，戰後擔任「臺北市圖書文具商業同業公會的理事長」，1938 年時曾當選臺北市第二屆民選市議員。<sup>57</sup>三民書局的轉變除了經營內容的改變外，書局外貌更是改弦易轍，1945 年時趁著光復熱潮，他將原名日光堂書店，增資改名為「三民書局」，並於店頭上方掛孫文照片，中間則書「革命尚未成功」云云，下方則掛蔣介石照片，此舉吸引不少民眾駐足圍觀；並率先在書店外升起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並趕做大批紙製國旗供給各商店及市民懸掛。<sup>58</sup>

三民書局在戰後亦面臨書源缺乏的問題，因此其經營項目除了新刊書

<sup>55</sup> 《新知識月刊》由王思翔、周夢江主編，聘著名作家執筆，如有張禹之〈現階段臺灣文化的特質〉、楊清華〈臺灣經濟之過去和現在〉、樓憲之〈臺灣歷史上的光榮〉、周夢江〈從澀谷慘案說起〉等時論文章。《臺灣新生報》，1946 年 8 月 14 日，版 3。

<sup>56</sup> 王思翔：〈臺灣一年〉，《臺灣舊事》，頁 29-30。

<sup>57</sup> 陳芳明編：《蔣渭川和他的時代》（臺北：前衛出版社，1996 年），頁 360。〈蔣渭川氏〉，《臺灣新生報》，1946 年 8 月 14 日，版 3。

<sup>58</sup> 陳芳明編：《蔣渭川和他的時代》，頁 361。河功原撰，黃英哲譯：〈戰前臺灣的日本書籍流通（下）—以三省堂為中心〉，《文學臺灣》，29 期（1999 年 1 月），頁 215-216。

籍的批發外，也經營新舊書籍、文具的買賣；<sup>59</sup>書局亦是當時「臺灣民眾協會」總部，臺灣民眾協會會員眾多，約數萬人，多是過去「臺灣民眾黨」的成員，因為蔣渭川接受省黨部的建議，將「臺灣民眾協會」改為「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臺灣省黨部透過蔣渭川與為數眾多的「政治建設協會」成員聯合，在全省設有 17 個分會，因為幹部都是國民黨員，因此蔣渭川的「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成了國民黨臺灣省黨部協助下的團體。<sup>60</sup>

## 肆、大陸的出版業者來臺設立分店

戰後除了一般中文圖書的缺乏，教科書更是迫切的需要，最初臺灣尚來不及印製教科書而以進口為主，但是進口的教科書有限，以致臺灣教科書仍非常的缺乏，雖然可以使用「國定本」、「部定本」，但在 1946 年開學時，學生尚無課本可用，為了應付上課，學校也不得不東拼西湊，以解燃眉之急；<sup>61</sup>戰後初期幾家出版教科書的業者來臺設立分店，幾乎都是為了經銷所出版教科書為主要業務。

教科書因為必須得到教育部的審定認可，所以往往受官方勢力所主導，而教科書也往往占了最大的圖書市場；來臺設立分店的幾家書店，負責人都有其政治背景，經營就以進口自家出版的教科書為主，如正中書局、開明書局、商務印書館等。以下則來看這幾家書店來臺設立分店的時間，最早應是正中書局；然後是開明書局、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則到 1947 年才踵續其後來臺。<sup>62</sup>

<sup>59</sup> 〈三民書局廣告〉，《人民導報》，1946 年 4 月 19 日，版 1。

<sup>60</sup> 陳翠蓮：《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相》，頁 242-243。

<sup>61</sup> 《中央日報》，1950 年 1 月 18 日，版 7。

<sup>62</sup> 對於各書店來臺成立時間略有不同的說法，在范岱年：〈范壽康與商務印書館〉一文中認為最早來臺設立的是開明書局。王德威：〈由創作到出版〉文中說：「1946 年臺英社成立；1947 年有臺灣商務、中華書局；1949 年世界書局、正中書局，在臺重新成立。」

### (一)正中書局臺灣分局

正中書局是國民黨中央黨部的書局，由「CC 派」陳立夫主導。書局挾其先天優勢，戰後復員於南京，特准接收了淪陷區上海、北平、青島三處印刷廠，連同重慶印刷廠共為四所，擁有印刷機 96 部，成為同業中印刷生產能力最高的書店。除了接收印刷廠外，並積極開始在全國布建分支局 27 所，正中書局臺灣分局即是其中一所，時間約在 1946 年 4 月 18 日。<sup>63</sup>

當時「CC 派」勢力掌控了教育文化界，<sup>64</sup>故正中書局也主要以出版教科書為主，涵蓋了小學初高級教科書、中學初高級教科書、師範教科書、職業學校教科書、大學各院系用書。<sup>65</sup>書店之所以會來臺設立分店，主要是奉國民黨中央黨部命令，<sup>66</sup>以銷售正中書局出版的中小學教科書及黨義書籍參考書為主，而各級學校是其主要銷售對象。

因為其所出版的中小學教科書，被指定為國定本教科書，臺灣分局成立僅幾個月即徵求特約經銷處，並且給予經銷處優待比一般利潤增加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批貨時可分批繳還現款。<sup>67</sup>

正中雖然掌握了教科書發行權，但是所出版的教科書卻一直為外界多所詬病，例如在 1946 年時，長官公署代電中即指正中書局出版的初級中學外國地理上冊，臺灣、朝鮮尚屬日本版圖，內容上未加訂正，照舊發行。教科書的內容原本針對大陸學童的程度，對於原本使用日文的臺灣學童來說，過於艱難；而版本上也無法因地制宜的更改，如生在沒有下雪的臺灣兒童，無法理解冬日雪景的景象；且有部分發行於臺灣的教科書，紙張惡

<sup>63</sup> 正中書局編：《正中書局六十年》（臺北：正中書局，1991 年），頁 25-27。

<sup>64</sup> 陳翠蓮：《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相》，頁 225。

<sup>65</sup> 〈廣告〉，《公論報》，1948 年 7 月 2 日，版 2。

<sup>66</sup> 〈正中書局開幕啟示〉，《臺灣新生報》，1946 年 4 月 18 日，版 1。其開幕啟示中說：「本局奉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之命，來臺設立分局，現已籌備就緒，由滬運來大批國定本、及本局出版中、小學教科書、本黨黨義書籍、參考資料等，以供本省各學校、各界之用。茲於本月十八日開幕。」

<sup>67</sup> 〈廣告〉，《臺灣新生報》，1946 年 7 月 10 日，版 1。



劣，以致印刷欠佳，品質與其他省的教科書有所不同。<sup>68</sup>

這是因為書店雖然來臺設立分店，但書店的重心仍不在臺灣，所出版的教科書仍以大陸兒童為主，無法因地制宜的編撰適合當地學童的教科書；而所進口的書籍也未針對臺灣人的需要，以致日文小說雜誌仍是臺灣人的主要閱讀品，移植的書店多抱持著多一個經銷據點的心態來臺設立分店，因此無法打開臺灣人閱讀中文圖書的市場。

正中真正將重心遷移至臺灣，是在 1948 年 11 月時，因為局勢動亂，將總公司遷來臺灣的書局，正中書局將檔案、帳冊、紙型裝箱分批運送臺灣，並於臺北寧波西街及臺中市府路購置樓房，準備作總處遷臺之用。到 1949 年 4 月時，已下野的蔣中正即將由溪口來臺，陳立夫也正式將總處遷來，上海則改設辦事處。同年 5 月 11 日正中員工陸續抵臺，並於 5 月 23 日開始辦公。原本正中書局的臺灣分局此時改為發行所，掌管全省批發及門市業務。<sup>69</sup>原先遷臺工作是由總經理葉溯中擔任，到正式辦公後總經理一職由吳大鈞接任，葉溯中則另組復興書局，於 1950 年正式成立，<sup>70</sup>復興書局後來亦成為臺灣出版教科書的重要書店之一。

### （二）開明書店臺灣分店

因為教科書的迫切需要，教育處原先規定採用開明、正中兩家出版的教科書，<sup>71</sup>所以開明是繼正中來臺的第二家書店；當時教育處處長的范壽

---

<sup>68</sup> 首峰：〈教科書〉，《臺灣新生報》，1946 年 11 月 27 日，版 3。〈談編輯小學教本〉，《臺灣新生報》，1947 年 12 月 26 日，版 2。

<sup>69</sup> 正中書局編：《正中書局六十年》，頁 29-30。

<sup>70</sup> 阮毅成：〈我來臺灣的第一年（下）〉，《傳記文學》，42 卷 3 期（1983 年 3 月），頁 99。

<sup>71</sup> 「內地出版國定教本，本省採用不受任何制限」、「省教育處規定各校自 35 學年度下半期起，一律採用國定本或審定本，之前因為與大陸間運輸困難，所以暫行規定採用開明、正中兩家出版的教科書，這之後中華、商務、世界出版的國定課本及審定課本都可以採用。」《臺灣新生報》，1946 年 7 月 27 日，版 2。

康為了解決教科書問題，力促開明來臺設立分店的；<sup>72</sup>來臺時間約在 1946 年下半年，店址在中山北路一帶。

開明書局的教科書除了自上海進口，也有在臺灣印製的，但是教科書的印刷用紙卻必須由上海運來，<sup>73</sup>不論進口或在臺印製，教科書價格都比大陸貴；除了出版教科書外，尚有出版總店所出版的其他書籍，如《原子能與原子彈》、《從原子時代到海洋時代》、錢鍾書的《談藝錄》、王易今翻譯的《古代世界史》。

### (三)中華書局臺灣分局

臺灣各地教科書一直非常缺乏，省教育處對於教育部所定教科書版本原是開放開明、正中兩家，但因由上海運來臺灣，仍不夠學子的使用，於是再開放中華書局、商務及世界書局的所出版的教科書，<sup>74</sup>於是中華書局是來臺的第三家書局。

中華書局原於 1912 年設立於上海，創辦人為陸費伯鴻，書局以編輯出版教科書為主，中華書局臺灣分局的設置比一般書局較晚，在李翼中（當時是社會處處長，亦是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負責人）、及臺北市長游彌堅支持下來臺設立分局。<sup>75</sup>中華書局最早只在臺灣設有特約店，店址設在臺北市長安東街；直到 1947 年 4 月 25 日時，才開始決定籌設臺灣分局，先在博愛路設臺灣分局「籌備所」，在館前路設立「臨時營業處」；<sup>76</sup>其臺灣分局正式開幕是在 1947 年 7 月 21 日，其經營也是以教科書為主。這些來臺設立分店的書店，多少帶有半官方機構色彩，主持人挾其豐富的政治背

<sup>72</sup> 范岱年：〈范壽康與商務印書館〉，見蔡元培等：《商務印書館九十年》（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 年），頁 322。

<sup>73</sup> 〈開明書店臺灣分店廣告〉，《臺灣新生報》，1949 年 1 月 5 日，版 1。

<sup>74</sup> 〈內地出版國定教本，本省採用不受任何限制〉，《臺灣新生報》，1946 年 7 月 27 日，版 2。

<sup>75</sup> 〈中華書局謹謝啟事〉，在啟事中對李翼中、臺北市長游彌堅的協助下解決房舍店面的問題而致謝，《臺灣新生報》，1947 年 7 月 21 日，版 1。

<sup>76</sup> 〈上海中華書局籌設臺灣分局啟事〉，《臺灣新生報》，1947 年 4 月 28 日，版 10。

景，不但掌握了中小學教科書的出版與經銷，對於分店的房舍也有政府協助安排。尤其在面臨印刷用紙配給時，紙張往往優先配給教科書用紙，有的甚至銷售也有官方的支持。

#### （四）商務印書館臺灣分館

頗負盛名的商務印書館，在最鼎盛時期全國各地設有 37 個分、支館，戰後在臺灣並沒有打算設立分館，最初只是籌設現批處，現批處的規模不僅小於分館，連支館也不如；但 1947 年時臺灣省政府成立，因此上海總管理處指示，因為臺灣已改制建省，應提高層次，於是決定改設分館，乃聘戰前曾任總管理處會計科科長的趙叔誠為經理，並與會計陳貽成自上海來臺籌設商務臺灣分館。<sup>77</sup>臺灣分館是商務海內外 38 家分館中，資歷最淺，規模最小的，全館人員僅 10 餘名。<sup>78</sup>

籌設之初，館址設在臺北市許昌街。趙叔誠經理到任後，另外購置距離許昌街百餘公尺之重慶南路的館舍，花費數月修繕，1948 年 1 月 5 日臺灣商務印書館分館正式開幕，並遷入營業，販賣上海運來的圖書。臺灣分店當時營業項目可分為五大類：(1)學校課本；(2)參考圖書；(3)辭書字典；(4)藝術印品；(5)文具儀器。<sup>79</sup>圖書都是抗戰勝利復員後在上海出版的書刊，種類約有三、四百種，每種進口一、二十冊至近百冊不等，因當時臺灣普遍推行國語運動，所以教育部中國大辭典編纂處所編的《國語辭典》四厚冊，以及趙元任製作的注音符號留聲片附讀本，有不錯的銷售量。<sup>80</sup>

商務印書館臺灣分館一直是有計畫的出版，它與臺灣省教育廳合作出版一系列的《新小學文庫》。1948 年時，商務印書館所出版的《新小學文

<sup>77</sup> 韓錦勤：〈王雲五與臺灣商務印書館（1964-1979）〉，師大歷史所碩士論文，1999 年，頁 59。

<sup>78</sup> 久宣：《出版巨擘商務印書館—求新應變的軌跡》（臺北：寶島社，2002 年），頁 65。

<sup>79</sup> 〈商務印書館臺灣分館遷移啟事〉，《臺灣新生報》，1948 年 1 月 6 日，版 1。

<sup>80</sup> 臺灣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 100 週年／在臺 50 週年》（臺北：編者，1998 年），頁 59。

庫》、《新中學文庫》，這兩部大部頭的套書在商務印書館臺灣分館與省教育廳合作推廣下，由省教育廳統購 600 多部分發各國民學校，而《國民教育文庫》亦以代電通知各小學聯合統購，在臺灣有不錯的銷售成果。<sup>81</sup>

#### (五)世界書局臺灣分局

世界書局原由沈知方在 1921 年創辦上海，他原也是中華書局的創辦人，因與股東不合又獨立開辦了世界書局。後來卻賣給了李石曾、吳稚暉與張靜江等國民黨元老。因此世界書局代表國民黨另一派系的入臺，1948 年至 1949 年間當時的總經理李鴻球力主到臺灣設立分局。於是世界書局臺灣分局在 1948 年 7 月 15 日時正式開幕，書局位在重慶南路一段 99 號，是當時省府秘書長謝瀛洲將省府衛生實驗所的房子撥給了世界書局，就此成立。1949 年隨政府將上海總管理處及部分印刷機器隨之遷徙而來。<sup>82</sup>與開明書店、正中書局、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並稱當時五大書店。

除了以上幾家專門出版教科書的大書店外，上海其他書店也陸續來臺

<sup>81</sup> 臺灣省政府秘書處編：《臺灣省政府公報》，夏字第 35 期（南投：臺灣省政府秘書處，民國 37 年 5 月 11 日），頁 510。臺灣省教育廳於民國 37 年 5 月 7 日，代電各縣市的小學，電文如下：竊唯國民教育為整個教育之基礎，敝館為補助國民教育之推進，除供應教科用書外，近於師生雙方應用之整套參考書，復擬具有系統之編印計劃，其專供兒童閱讀者，曾編印《新小學文庫》二百冊，現已出齊，並仰賴鈞廳彙購六百數十部，分發各國民學校，使各學校咸能通宜之課外讀物，其專供教師閱讀者，最近復編成《國民教育文庫》一百冊，分為進修、補習、教育狀況、行政訓導、教材、教法、鄉村教育、成人教育等組，已出四十八冊，餘書於五月內出齊。《國民教育文庫》之執筆者，或為當代教育名家，或為各地輔導專員，或為實際從事教學之優良教師所著，各書均能發揮正確之理論，表現宏富之經驗，戰後最新資料亦多已採入，俾讀者可在進修行政施教各方面獲得切實之裨助，該文庫現正發售，特價照原價七五折計算，每部計售臺幣四萬另五百元。茲為優待彙購起見，凡一次購滿全集一百部者，得照特價再打九折，即每部僅實收臺幣三萬六千四百五十元。隨文附國民學校，或通飭各校聯合彙購，使各校教師均有優良讀物可資進修，提高師資水準，即所以提高教學水準，國民教育之推進，將於此獲致實效，不僅敝館感幸已也。

<sup>82</sup> 黃威傑：〈城市文事空間的流變—臺北書店空間形貌轉化之探討〉，東海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2000 年，頁 21。

設立分店，兒童書局即是其中較特別的。

### （六）兒童書局臺灣分局

兒童書局是在 1930 年 2 月時由張一渠與石芝坤兩人合資創設於上海，在 20 年代上海出版業發展迅速時，大部分都以文學和社會科學類的書籍為主，原任職於泰東書局經理的張一渠，認為辦一家兒童讀物的專業出版社大有可為，於是與石芝坤合資創辦兒童書局，可算是第一家兒童讀物的專業出版社。其出版各類兒童讀物和教育書籍達一千多種，其中叢書二十餘種，期刊六種，暢銷全國各地。<sup>83</sup>兒童書局臺灣分局是在 1946 年 4 月 4 日兒童節當天開幕，<sup>84</sup>設址在臺北市，經理是盧魯泉，開幕沒多久即遷移至臺北市文武街三段（今衡陽路）營業，主要仍是銷售運來臺灣的幼稚園讀本、兒童圖書、名人故事叢書、及《看圖識字》、《苦兒努力記》等注音讀本；<sup>85</sup>除了兒童圖書外，還販售各種文具、運動器具等。

戰後臺灣不但教科書缺乏，就連兒童圖書也少，蕭乾曾在 1947 年 1 月 6 日的《大公報》中說道兒童讀物的缺乏：「民眾圖書館被接收了，當總理主席的像都高高掛起；但櫃子裡排立的還是宣揚『共榮圈』的『昭和兒童文庫』，即使把全國各書店印的兒童書，再搭上充滿了封建毒素的『小人書』，全搬了去，怕也填不滿那些日人為小國民編的龐大文庫：安徒生、葛萊姆、博物、歷史，精美有趣的叢書。」日本的兒童讀物是依年級而編著，相形之下，小學生所得印象是：中國是個沒有書的國家。因此以專門經營兒童刊物的兒童書局來臺設立分局，對臺灣兒童來說至少可以有兒童讀物可閱讀。但是兒童書局所引進各式適合兒童閱讀的圖書，卻受限於書價高昂，並非一般人所能負擔，這種兒童圖書在當時都被視為少部分有錢人才擁有的奢侈品。

<sup>83</sup> 吳興文：〈張一渠和兒童書局〉，《中國時報》，1992 年 2 月 14 日，版 33。

<sup>84</sup> 文建會編：《光復後臺灣地區文壇大事紀要》（臺北：文建會，民國 74 年），頁 5。

<sup>85</sup> 〈兒童書局遷移啟事〉，《臺灣新生報》，1946 年 7 月 2 日，版 1。

楊雲萍曾在〈近事雜記〉一文中說想買幾冊雜誌或讀物給家裡的孩子看，可是，跑遍幾處的大書局，仍找不到一冊可以合用的，內容且不說，只就「外觀」說，所謂給兒童或孩子的刊物，莫不「小」、「薄」的可憐。<sup>86</sup>小學生除課本之外，很難看到一本別的书。真正適合兒童閱讀的圖書少的如鳳毛麟角，能在裝潢美麗的書店玻璃窗裡找得到的，每本定價動輒便是一兩百元臺幣，一部成套的兒童叢書，就是幾十斤米的代價，在飯還吃不飽的當時，除了富商巨賈很少有人買得起課外書。<sup>87</sup>

小學生因為除了一套課本之外，沒有任何精神食糧，反而讓上海灘的連環圖畫書，趁虛而入。<sup>88</sup>這種連環圖畫書，以圖畫為主，並附以淺顯簡單的文字，小學生在學習方塊漢字時，感到非常吃力，一般讀物不但缺乏，而且閱讀困難，於是這種連環圖畫書很快的就從上海風行到臺灣。<sup>89</sup>臺灣南部幾家著名的出版公司，當初即是由租書店一步步走過來的。像位於臺中的良友租書店，即以租武俠小說、連環圖畫書為主，在戰後初期文化資源短缺的情形下，扮演著書籍流通的角色，正好彌補了公共圖書資源不足的遺憾。而租書店與流動租書攤的盛行，也成了 1950 年代臺灣閱讀市場的主流。<sup>90</sup>

<sup>86</sup> 楊雲萍：〈近事雜記（十二）〉，《臺灣文化》，3卷2期（1948年2月），頁19。

<sup>87</sup> 方師鐸：〈我們需要注音讀物〉，《臺灣新生報》，1948年1月18日，版5。

<sup>88</sup> 紫翔：〈臺灣國語推行的回顧與展望續〉，《公論報》，1949年2月15日，版3。

<sup>89</sup> 楊乃藩：〈小人書到臺灣〉，《臺灣新生報》，1947年7月25日，版2。連環圖書之所以如此風行，據楊乃藩的說法是：「第一，它是圖文對照的，文字可以幫助了解圖畫的內容，圖畫可以增加閱讀文字的能力；第二，文字淺近通俗，有時插入方言；第三，因為是石印的字體為手寫體，不比鉛字排印書籍有隔閡感；第四，故事內容，取材古時傳聞或小說，或最近發生的事，都是一般人所熟悉的；第五，正如「連環圖畫」名稱，每頁的字文和圖畫相連貫，非看下去不可；第六，取無說教色彩，以逍遣為目的，所以老少咸宜；第七，編繪者以舊小說渲染筆法，特別強調忠奸、善惡、是非的辨別，所以能迎合閱者心理；第八，裝訂輕巧，攜帶方便；第九，種類繁多，層出不窮；第十，以出租方式推廣，深入社會每一角落。」

<sup>90</sup> 南方朔：〈世代的閱讀故事〉，《皇冠 50 週年讀樂節》，2004年7月，頁21-22。

### (七)主日學協會書店

而另一類特別的書店是在 1907 年成立於上海的中國主日學協會書店，也於 1946 年來臺，在臺北市中山北路籌設分店，書店賣的是培養主日學教師與屬靈書籍，中、西文都有，書店當時只是一間日式的矮房子，可說是臺灣第一家出版販售基督教書籍的書店。<sup>91</sup>

### (八)經銷商

此時上海不少書店為了經銷上海圖書，特地來臺設立分店，如東方書店、上海文光書局、中國書報發行所、啟明書局、上海書報社等，這些書店多是由上海來臺經營的經銷商，設立時間也是在 1946 至 1947 年間；戰後初期書店往往與出版社之間業務難以區隔，但是經銷商的紛紛成立是圖書產銷分業的開始。

其中東方書店在當時算是規模不小的書店，是由儲祥原獨資經營，臺灣分店的設立先在臺北市民生路，後遷至重慶南路，此時重慶南路承襲日治時期書店聚集之處，書街已漸成形。東方書店的經營由報紙廣告中來看，<sup>92</sup>其營業部分為四，有圖書部，有經銷發行教科圖書、一般書籍、原文西書；文具部，則承辦各機關文具、學校教育用品、運動器具及儀器；服務部，則辦理書籍郵購、代辦專門書刊；承印部，則承印卡片、禮帖、封箋等，可以發現這時期的書店仍是多角化的經營，每家書店多少都有書籍的出版。

而中國書報發行所的報紙廣告首見於 1946 年 6 月 5 日，其來臺設立分所的時間也約是此時。上海的永祥印書館則與本土的青年出版社合作，1947 年成立的青年出版社，由莊鶴、張柏亭、黃強、陳貞彬、蘇光宇、黃聯登、唐賀等人所組織，出版社除了定期刊物出版外，並將其出版社以出租方式，

<sup>91</sup> 〈55 年前福音車巡迴賣書〉，《聯合報》，2002 年 11 月 19 日，版 19。

<sup>92</sup> 〈廣告〉，《公論報》，1948 年 7 月 8 日，版 1。

讓上海的永祥印書館來臺設立分館販售圖書。<sup>93</sup>

這些書局仍是以進口圖書，尤其上海一帶出版的一些期刊，來臺銷售為主，期刊還能利用航空版行銷臺灣，並且擁有不錯的銷售量。中文圖書自上海進口，最初僅是一些教科書，除了教科書外，還有以學習國語為主的工具書，至於其他的書籍則非常少；這是因為當局在推行中文和國語的同時，卻竭力限制大陸和臺灣之間的正常往來，尤其是嚴格限制大陸書報的進入，遏制了戰後臺灣文化的復甦、發展的生機，當時大陸省市出版的報紙能在臺灣公開發行的只有《大公報》等少數幾種，還不免被檢察官所扣押。<sup>94</sup>上海的大書店發展到臺灣之後，少數進口的中文圖書往往曲高和寡，除了對初學中文的臺灣人來說過於艱深外，價格亦是重要的因素；相對的，以一些來臺設分店的書局來看，對於臺灣知識分子不習慣閱讀中文圖書，又頗感到失望，「一些在臺設分店的書局，談起臺灣文化出版事業，莫不表示失望，這些從內地運來的書籍，購買的人很少，而且購書的人，大多是外省到臺灣來的，本省人連到這種書局中去看書的興趣也十分缺乏！」<sup>95</sup>以致這些書店的銷售對象，仍是以來臺的外省人為主要客層。

## 伍、結 語

戰後初期臺灣的中文圖書原本就少，當時的知識分子覺得需要讀書，卻無書可讀；原本日本人所經營的出版業，隨著日人戰後的遣返，經營權不是易主，就是結束營業；而臺灣人所經營的書店，也因為文化上面臨由日文轉換為中文的問題，在文字語言的改變及新的文化衝擊下，不僅創作品減少，圖書出版減少，書店中可售圖書也大為減少；在許壽裳任教育廳

<sup>93</sup> 〈青年出版社創立宣言〉，《臺灣新生報》，1947年11月18日，版2。〈臺灣青年出版社啟事〉，《臺灣新生報》，1948年4月13日，版4。

<sup>94</sup> 王思翔：〈臺灣一年〉，《臺灣舊事》，頁28。

<sup>95</sup> 金聖泣：〈生根的問題〉，《公論報》，1948年4月10日，版4。



長時亦曾談到書籍問題，表示在剛光復時街上的中文書擺滿了《三字經》、《百家姓》一類的讀物，這現象一方面表現出閱讀中文圖書的熱忱，另一方面卻反映出書籍供應的缺乏，使得市面上沒有適當的書可讀，後來這種現象雖然有所改善，書局漸多，書籍漸漸豐富，但是由於運輸不便，沒有大量書籍運來，書價太貴，一般學生與民眾根本買不起圖書，所以書籍供應範圍仍然有限。<sup>96</sup>

因為書店所出版的中文圖書仍在試探摸索階段，在臺灣人眼中對於這些圖書並非一般人所需要，報紙社論諷刺這種現象：「國內出版品，從學術名著到色情漫畫，源源而來，可謂『應無盡有』，可是臺灣所需要的書還是『應有盡無』。」<sup>97</sup>尤其在一些圖利書商自上海進口來臺灣的刊物種類開始多樣後，幾乎大半都是一些無聊小報和《大觀園》、《上海灘》、《七日談》、《東南風》、《上海特寫》、《大地》、《星光》、《新光》、《新聲》、《海花》之類海派雜誌，真正有價值拿得上手的書報刊物，反而寥寥無幾。<sup>98</sup>隨著上海色情文學的輸入，在博愛路書店中也有些開始販售此類的小說。<sup>99</sup>而真正為臺灣人編的書卻往往由於印刷成本的高漲，臺灣所需要的書，編出來，也印不出來，印出來，也賣不出去。因此書店自上海進口中文圖書，但也因為進口種類的無法滿足臺灣知識分子的需要，即使圖書館的採購也不得不自行前往上海。<sup>100</sup>於是形成了本省與外省之間，截然兩個世界，互不相

<sup>96</sup> 〈本省教育問題，許教育廳長廣播詞〉，《臺灣新生報》，1947年6月22日，版3。

<sup>97</sup> 紫翔：〈臺灣國語推行的回顧與展望續〉，《公論報》，1949年2月15日，版3。

<sup>98</sup> 〈社論〉，《臺灣新生報》，1946年8月8日，版2。

<sup>99</sup> 何欣：〈嚴禁色情文學入境〉，《臺灣新生報》，1946年10月5日，版2。

<sup>100</sup> 〈省立圖書館籌購〉，《臺灣新生報》，1946年6月13日，版2。戰後初臺灣省圖書館的圖書，大都為西文及日文，中文書籍甚少，當時省立圖書館僅有日文圖書18萬冊、西文圖書3萬多冊，中文圖書約5萬冊；但這5萬冊的中文圖書仍是一些《四部叢刊》、《二十五史》類中文古書，不適合一般民眾的需求，為適應環境需要，須大批購置圖書，所以特別撥購書經費每月五萬元赴上海採購中文書籍。……第一批自上海購得《四部叢刊》、《萬有文庫》、《叢書集成》、《廿五史》、《辭源》、《辭典》等，計法幣200萬元；然後又派員至上海購置新出版的圖書、雜誌、文藝等書籍，計法幣500萬元左右。除了新書外並購舊書，向臺大日籍教授購約4萬冊書計臺幣23萬。劉滿子：

干，各自為政；本省、外省各有所嗜讀的書，從上海運來的書，僅是為外省人自己的需要，甚至只充作工具，而臺灣年輕男女仍只耽讀日文戀愛小說或日文舊雜誌。<sup>101</sup>

戰後初期臺灣的出版業者，就在這文化衝擊中，不斷地調整經營內容，摸索出一條可生存的空間。於是不論新書的出版或舊書的買賣，此時都兼營並生；在物質缺乏的年代，匱乏的圖書與居高不下的圖書價格，使得「舊書買賣」擔負起文化流通的重要媒介，這反映出當時鬻書度日物質生活的困窘與精神層面的匱乏。而許多大陸出版教科書的業者，為了在臺販售教科書，紛紛開始在臺設立分店；但是臺灣中文圖書的缺乏問題並不因來臺書店增加而解決，中文圖書的匱乏問題仍然持續著；在動亂中的 1949 年初，上海撤守幣值巨幅波動，所有圖書、雜誌幾乎全部斷絕。<sup>102</sup>

國民政府遷臺後，由於與對岸中共處於緊張敵對狀態，在實施戒嚴令後，禁絕了大陸書刊的進口，而本地可出版的圖書又不多，此時臺灣仍處於缺書的狀態，這種缺書的情形一直到 1950 年代臺灣開始大規模翻印圖書後，才漸漸有所改善。

但是戰後初期這短短幾年中，臺灣的出版業所呈現的風貌，成了日後臺灣出版市場的雛形，幾家在臺設立分店的業者多聚集在重慶南路附近，使得這條重慶南路書店街漸次形成，獨領風騷了數十年，而這五大書店（正中、中華、世界、商務、開明）也成了戒嚴時期復興中華文化運動下翻印古籍的主流出版者，它們有其黨政背景，以「復興中華文化，弘揚三民主義」為經營的宗旨。而本土的東方出版社則專致於兒童讀物、與教科書週邊產品的出版；具帶領思潮的專門書店則在新創造社關門後，沉寂了很長一段時間，直到文星書店的出現，才為臺灣的知識界撒下一粒種子；六十

---

〈本館成立經過及概況〉，《圖書月刊》，1 卷 1 期（民國 35 年 8 月 5 日），頁 17。

<sup>101</sup> 周勻：〈「生根問題」讀後〉，《公論報》，1948 年 4 月 19 日，版 4。

<sup>102</sup> 應鳳凰：〈五十年代臺灣文藝雜誌與文化資本〉，收錄於封德屏主編：《五十年來臺灣文學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建會，1996 年），頁 91。

年來過眼雲煙，半世紀前的滄桑舊籍，隨著時移勢轉，既成了時代的產物亦見證了歷史的腳步。

## 徵引書目

### （一）專書

- 久宣，《出版巨擘商務印書館一求新應變的軌跡》。臺北：寶島社，2002年。
- 文建會編，《光復後臺灣地區文壇大事紀要》。臺北：文建會，民國74年。
- 正中書局編，《正中書局六十年》。臺北：正中書局，1991年。
-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正中書局，1992年。
-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編，《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藏中文圖書目錄—民國元年至38年》。臺北：該館，1982年。
- 陳芳明編，《蔣渭川和他的時代》。臺北：前衛出版社，1996年。
- 陳翠蓮，《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相》。臺北：時報文化，1995年。
- 陳鳴鐘、陳興唐主編，《臺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南京：南京出版社，1989年。
- 黃玉齋編，《臺灣年鑑》。臺北：海峽學術，2001年，重印版。

臺灣文化協進會編，《臺灣文化》，1 至 6 卷，覆刻版。臺北：傳文文化，1994 年。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編，《臺灣一年來之宣傳》。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1946 年 12 月。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編，《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1946 年 12 月。

臺灣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 100 週年／在臺 50 週年》。臺北：編者，1998 年。

## (二)論文

子朴，〈臺北舊書業史話〉，收錄於應鳳凰、鐘麗慧編，《書香社會》。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84 年。

王思翔，〈臺灣一年〉，見葉云云編，《臺灣舊事》。臺北：時報文化，1995 年。

王順隆，〈談臺閩「歌仔冊」的出版概況〉，《臺灣風物》，43 卷 3 期（1993 年 9 月）。

阮毅成，〈我來臺灣的第一年（下）〉，《傳記文學》，42 卷 3 期（1983 年 3 月）。

周婉窈，〈臺灣人第一次的「國語經驗」—析論日治末期的日語運動及其問題〉，《新史學》，6 卷 2 期（1995 年 6 月）。

河功原撰，黃英哲譯，〈戰前臺灣的日本書籍流通—以三省堂為中心〉，《文學臺灣》，27 期（1998 年 7 月）、28 期（1998 年 10 月）、29 期（1999 年 1 月）。

南方朔，〈世代的閱讀故事〉，《皇冠 50 週年讀樂節》，2004 年 7 月。

范岱年，〈范壽康與商務印書館〉，見蔡元培等，《商務印書館九十年》。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 年。

張禹，〈現階段臺灣文化的特質〉，《新知識》月刊，覆刻版，民國 35 年 8

月 15 日。

梅丁衍，〈黃榮燦疑雲—臺灣美術運動的禁區（上）〉，《現代美術》，67 期（1996 年 8 月）。

黃威傑，〈城市文事空間的流變—臺北書店空間形貌轉化之探討〉，東海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2000 年。

葉龍彥，〈第一位來臺的木刻畫家—黃榮燦〉，《臺北文獻》，直字 128 期（民國 88 年 6 月）。

蔣紀周，〈我國圖書出版事業之發展與現況〉，見行政院新聞局編，《中華民國 64 年出版年鑑》。臺北：行政院新聞局，民國 64 年。

蔡盛琦，〈新高堂書店：日治時期臺灣最大的書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9 卷 4 期（2003 年 12 月）。

應鳳凰，〈五十年代臺灣文藝雜誌與文化資本〉，收錄於封德屏主編，《五十年來臺灣文學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建會，1996 年。

鍾華，〈文藝簡論〉，《創作月刊》，1 卷 1 期（民國 37 年 4 月 1 日），《臺灣舊雜誌覆刻系列》3 之 1。

韓錦勤，〈王雲五與臺灣商務印書館（1964-1979）〉，師大歷史所碩士論文，民國 88 年。

### （三）報紙

《人民導報》，1946 年。

《中央日報》，1950 年。

《公論報》，1947 年 11 月至 1949 年 8 月。

《民報》，1945 年 10 月至 1947 年 2 月。

《臺灣新生報》，1946 年 8 月至 1949 年 10 月。